

漢字整理問題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傅孟真先生八秩晉四冥誕學術講演

周法高

所謂“漢字”，和“漢語”是相關的，“漢語”一般叫做中國語，“漢字”也可以叫做中國字，也有人叫做“國字”，那就和“國語”平行了。不過我在這裏所講的漢字，不限於在中國流行。例如日本的漢字，韓國的漢字，越南的漢字等。

關於漢字的讀音，也隨各地的方言而讀法不同，如果各人用他的家鄉話來讀漢字，那麼，廣東人用粵音，福建人用閩音，每一方言區裏可以有若干種小分別的方言，那麼漢字的讀音也就隨方言而異了。這是漢字的一種獨特的現象，是拼音文字所沒有的。

不但如此，在唐代因為國力的強盛，漢字在日本、韓國、越南等地區也相當流行，也各有他們的讀法，大體反映出他們移借時所根據的中國方言，同時也受了他們音韻系統的特性的限制，因此日本譯音（包括“吳音”、“漢音”等）、高麗譯音、安南譯音^①就成為近代語言學者構擬唐代語音的一種依據。例如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名著《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就根據三十三種方言

① 高本漢《中國聲韻學大綱》（《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1954）中譯本（張洪年譯，民國六十一年，1972）頁7說：“大部分高麗文的中國借字可溯源於公元六百年左右，即與《切韻》的中古音同時。在日本借字輸入，可分兩次。一方面，所謂‘漢音’借字者，是由中國北方輸入，時間上特別是七世紀這段時期，而在聲韻類別的差異上，和《切韻》很近，正如高麗譯音一樣。另一方面，又有另一批借字，從中國東南部傳入，所謂吳音是也（吳者今江浙一帶）。這批借字時間較古（五——六世紀），所代表的是一種或若干種方言，與《切韻》頗為不同，然而在聲韻類別上，吳音所具的同異，《切韻》亦有；因此對於解釋《切韻》音系，吳音又極為重要。最後，所謂安南譯音者則較遲——約在唐末，但在許多方面，仍頗有啟示。”

(包括上述幾種域外方言)而構擬出《切韻》的音值來,其他的學者也利用這些材料來加以修訂。

不過域外漢字的影響已經比不上過去的極盛時期了。越南聽說已經用音標代替漢字,韓國也有同樣的傾向,不過似乎沒有越南的澈底^②。而日本的漢字還依舊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可以說如果日文裏沒有漢字,就幾乎有好多地方看不懂。所以漢字整理的工作,在日本也非常重要。

照我的看法,所謂“整理”,和“研究”有點不同。“整理”含有整齊劃一的意思,注重實用的價值,因此對當前的問題可能有較大的關聯。“研究”偏重在求真,其有無實用價值並不是主要的。例如研究中國文字的人,一般都偏重古代。後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因為有好多問題不能解決,仍然不能滿足研究文字者的要求,因此進一步要研究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的金文等等,甚至推尋五、六千年前的原始文字。這樣做法主要的目的是求真,當然可以藉此明瞭古代文化的真面目,對中國文字發展史方面也有貢獻。可是當前的文字,因為可供研究的方面不多,就不大容易引起文字學者的興趣了。反而教育學者、教育心理學者、社會學者、大眾傳播學者,為了解決當前漢字的教學問題、傳播問題,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當前的文字方面,以求對教學、傳播方面能有所貢獻。據我目前思考所及,整理漢字方面應包括下列一些問題:

- 一、漢字點劃的統一問題和簡化問題,以及字音的規範化問題;
- 二、常用漢字的選擇問題以及由漢字構成的常用詞彙選擇問題;
- 三、漢字打字和電腦作業問題。

以上僅就比較重要的三方面來說,至於字典的編纂、漢字的結構和數量、漢字的前途、漢字學習的難易諸問題,也是整理漢字的人所應該考慮到的。至於參加的各科學者,除了上面所舉的各科學者而外,還需要電腦專家和機械工程學者來參加。以上所舉三項,每一項都可請專家作一系列的講演,本人在這裏只不過籠統提出來,並不希望在這一次簡短的講演裏有所貢獻。

先就第二項常用漢字的選擇問題來說吧!民國五十六年(1967)十月,國立編譯館主編的《國民學校常用字彙研究》由中華書局出版了。該書從報章、國民學校課本、兒童作品、課外讀物、廣播稿和民衆讀物等六種資料計共753,940字當中,經分析統計而得4,864個字。其中擬定為常用字的有3,861個,次常用字574個,備用字429個。前有《國民學校常用字彙研究報告》50頁,立論平允;後有部首索引,甚便檢查。這可以算是常用字彙的一部有分量的作品,可以拿來和聯合報社在該項研究完成的時候所出版《聯合報中文自動鑄排機常用字彙表》參看,該表以聯合報抽樣作主要的對象,整理出2,356個字來,其所根據的資料,顯然有異於國民學校兒童讀物,但在互相對照之下,

^② 汪學文《中共簡化漢字之研究》(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頁102:“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韓國教育部更決定修改中學韓文教科書,允許二千個漢字與韓國字一併使用。此舉正式中止一九七〇年以來教科書完全韓國文化的政策,恢復教授和使用漢字。”頁106:“韓國的報紙是漢字加諺文字母,兩者同時使用,……北韓從一九四八年開始即已完全使用諺文字母,使用拼音文字橫寫。”

只有25字沒有在字彙研究中出現，其差異尚不及百分之一^③，可見該字彙研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④，不過常用字彙的分析工作，據該字彙研究頁41說：“國民學校詞彙分析工作，也已著手進行。”我對於本地教育情形，非常生疏，不知道這一種常用詞彙的研究會否出版或進行到甚麼程度。據我所知，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有講師簡國銓曾於民國五十六年（1967）進行過這種研究達二年左右，在該院的院刊《學記》第一期（1968年6月）曾發表《漢語字彙詞彙研究計劃及第一期工作報告》一文（頁73~92）。其辦法是將香港各種小學課本中的總字數452,466個，詞數261,437個^⑤，根據電報號碼輸入電腦，加以統計，可惜簡君後來到加州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後，此項工作即行停頓，真是可惜得很。我希望這種工作能夠在台灣利用電腦早日完成，對於教育學者和語言學者，都有很大的幫助；對於學童教科書的編排，那更是非常重要了。

要統計常用詞彙，首先要決定甚麼是“詞”。在歐美語文方面，因為有幾百年以上的拼音文字書寫經驗，所以可以說：凡是分開來寫的就是詞。在中文方面，就很成問題了。因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漢字都是詞素(morpheme)，所謂“詞素”是語義的最小單位，只有“玻璃”、“玫瑰”等少數詞素不是單音的。至於“詞”在中文中就有時很不容易確定了。不過艾偉在《漢字問題》頁104~107列出27條原則，簡君前一文中列20項原則，可供參考。

關於第三項，對於中文打字，如何能夠增加打字的速度、減少打字機的價格及縮小打字機的體積，這實在是一個嚴重的課題。我在民國六十一年（1972）十一月二十一日香港《星島日報》發表的《談中文發報打字》一文，曾經對這個問題作了一點概括的說明。因為中文收發電報和中文電腦作業以及中文打字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不妨合併討論。

民國三十三年（1944）王景春提出他的漢字拼音電碼設計，出版《新漢字檢字法及拼音法》，重視國際電報的拼音化。他的缺點是：太長，分部太多，不好記。民國三十六年（1947）應昌期提出他的漢字拼音電碼設計，出版《國音電報辭典》；後來在民國

③ 《國民學校常用字彙研究》頁40：“《聯合報中文自動鑄排機常用字彙表》，……所根據的資料，顯然有異於國民學校兒童讀物。其所得的字彙，按說也會和本研究字彙大有出入。但在互相對照之下，在《聯合報》的2,376常用字彙中，只有25字沒有在本研究字彙集中出現；另有32字是在本研究中被列為‘次常用字’，有5字是在本研究中被列為‘備用字’的。若只計算那些完全不會在本研究中出現的25字，則尚不及百分之一。細察這些字，卻也有趣：在女部有‘妓’‘娼’‘嫖’，貝部有‘賄’‘賂’‘贓’，言部有‘誹’‘謗’‘諭’等字。這些字在一般新聞紙上頗為常見；而在兒童讀物，卻尚未發現。而除去這些‘特殊’的字之外，《聯合報》所選的其他2,331字，在本研究字彙都已存在；是則兩種資料不同的字彙，還是同多於異了。”

④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橋本萬太郎教授告訴我：他在普林斯敦大學曾經收集了一百萬字的資料，統計漢字的常見度；不過因為是用電腦處理，例如“的”字的兩種讀法還未用人工分開，所以還未出版。

⑤ 艾偉《漢字問題》頁113統計商務《基本教科書國語》一至八冊總字數63,455個，總詞數37,365個，二者之比例與簡文所列大致相當。

三十七年（1948）又出版《拼音電報書》。他的設計脫離當時的國音拼法，另訂一套複雜的方言際拼法，這是他的基本缺點。民國五十四年（1965）周有光發表了《電報拼音化》一書。

據說IBM曾經根據林語堂的檢字法或高仲芹的檢字法設計電動中文打字機，葉晨暉也利用國語注音符號設計電動中文打字機，其成本都是非常昂貴，非一般機關所能負擔。關於電腦輸出入漢字的問題，根據報章雜誌的報導，台灣、香港、日本、美國、英國都有新的研究，不過我想中文發報打字和電腦作業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快速而準確地檢字的問題。而檢字方面不外據形檢字和據音檢字兩大派。像目前的電報檢字是根據部首和每部中的筆劃多少編號的，可以從0001到9999號（劉復曾經在四十年前編過一本中小字典，就是用電報號碼編號的）。其好處是只用四個號碼，而且非常普及，所以聽說美國加州大學、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都曾經或現在使用過現行電報檢字法把漢字輸入電腦，可是目前電報號碼非常難記，這是最大的缺點。

根據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三日《中央日報》周添城《中文電腦的最新設計》一篇報導說：

……這也正是當前中文電腦的一個關鍵所在。現在的處理方法包括：字根拼字法、四角號碼檢字法、部首偏旁代號法、大鍵盤或分組排列法、注音符號選字法、羅馬拼音法、注音對角法、以出現率分盤注音法、三角號碼法等等。……周俊良的中文編碼方法就是基於上述構想，一方面利用大家所熟悉的四角號碼來代表每個字的字形，另一方面利用注音符號來表示字聲。所謂“先形後聲法”就是，以字形為主，字聲為輔來標示一個漢字：一個字一個代碼；即可把中國字轉換成數碼了。

例如：以國字的“志”字為例，其四角號碼為4033，其注音符號為ㄓ。在他的編碼法裏，把這個字用下列的數字和符號表示，即“4033ㄓ”。這樣的方式每個中文字都有一個代碼而很少有重複的。這個方法比過去的各種方法較為周全。

法高按：中文的一個字並不相當於英文的一個 word，通常由一、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構成的“詞”才和 word 相當。拿注音符號來說，有21個聲母，16個韻母（包括3個也做介音的），一共37個，還有3個調號（陰平無號）。如果把結合韻母22個加進去，合起來有六十多。通常一個字的注音符號要三次鍵，再加上四角號碼，需按七次鍵，通常還不能相當於英文一個word。在打字方面，如和西文打字來比，還不能達到體積小和速度快的原則。其他各種檢字法，也同樣不能做到，由此可見中文電腦輸入的複雜性了。⑥

現在再提到第一點漢字點劃的統一問題，歷來都認為是必需的工作。《史記·秦始皇本紀》說：“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說文·序》也說：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段注：“然則自秦至司馬相如以前，小篆只有三千三百字耳。”當然在這以前，還可

- ⑥ 汪學文《中共簡化漢字之研究》頁139：“一部命名為‘復興一號’的萬國語文電動複式打字機已經研究成功，並於一九七六年（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在台北作示範表演。……一分鐘可打六十個中文字……”按六十個中國字並不等於六十個英文的詞。簡文頁91：“單字與詞的比例……在統計了各級課本的字和詞之後，發覺祇是1.7與1之比。換句話說，詞的數目比較預料為多。”艾書頁115：“至小學最後一年之國語課本中二音詞之百分比且超過單音詞而居首要點。”關於英文單字的字母和音節數，本人曾函詢師範大學和中央大學英語系楊景邁教授，回信說：

“英文打字，以五個字母作一個字計算。此乃一般通則，別無權威根據。至於音節，邁會將最常用一千字略作統計，每一英文單字平均約1.353 (=1447/1069) 音節。所謂最常用一千字係根據：Edward L. Thorndike and Irving Lorge, 《The Teacher's Word Book of 30,000 Word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2。(1)常用率愈低，恐怕每字平均音節數會較高。(2)專門性著述所用文字（如醫學，化學），平均音節數目恐也較高。(3)以上所謂‘一千字’係 general count。”

本人謹對楊教授表示謝忱。根據艾、楊二家約略的估計，我們可以知道中英文一個詞所佔的音節數可能沒有太大的出入。英文大約平均五個字母構成一個單詞，其打字的速度大約不會比打一個中文字慢；換言之，平均打一個英文的 word 可能比打一個中文的詞要快一倍。我曾經把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譯本（商務）中的作者贈序和趙元任先生的譯文對照統計：如除人名、書名不計。則為英文518 word，中文784字，其比例大約是一個word相當於一個半中文字。中文784字中約有200個複詞，約420字，加上單音詞，約有560個詞，平均每詞約佔1.4字。英文518 word 中，約有767個音節，平均每個 word 約佔1.48音節。關於國語音素的統計，我的學生何國祥君曾經發表過《漢語常用音素之研究》（A Study of the Re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yllabic Compon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第一期》，1976, PP. 275-352）一篇英文論文，根據前引《國民學校常用字彙研究》一書中分析漢字之字音及統計每字之出現次數，例如該書指出出現次數最多的是“的”ㄉㄛˊ(de)字，計達26,738次，此研究即在聲母ㄉ(d)、韻母ㄝ(e)及輕聲項下各加26,738次；至於出現只一次的，則有565字。該文利用電腦得出結果約略如下：

(一) 聲母：七十五萬字資料中，沒有聲母的有十一萬，相當於總數的15%。其他有聲母者，/d/ㄉ之出現次數最多，佔全部資料之10%，其次為/sh/ㄕ(7.81%)、/j/ㄐ(6.38%)，較不常用的是/r/ㄖ(1.94%)、/ts/ㄗ(1.13%)和/p/ㄆ(1.00%)。據統計，國語中的ㄓ、ㄒ、ㄑ、ㄒ、ㄓ、ㄌ和ㄐ、ㄑ、ㄒ三組音的總出現次數，佔全部資料的40%。

(二) 韻母：最常用的韻母是/e/ㄝ，佔總次數的9.28%，其次是/i/ㄟ(9.25%)、/u/ㄨ(6.59%)、/r/ㄖ(5.44%)、/uo/ㄨㄛ(4.41%)；較不常用的是/io/ㄟ和/iai/ㄟ，各佔總數的0.001%而已。絕大多數(72%)漢字沒有介音，其他有/i/ㄟ介音的出現次數佔總次數的15%，有/u/ㄨ介音的佔11%，/iu/ㄨ介音最少用，只佔總數的2%。

(三) 聲調：國語五個聲調中(包括輕聲)，去聲在全部資料中的出現次數最多，佔總次數的34%，其次是陰平(21%)、陽平(20%)、上聲(18%)和輕聲(6%)。

能有“黃帝之史倉頡”、“周宣王太史籀”(均見《說文·序》)整理文字的說法，不過秦始皇命丞相李斯等同文字的工作，拿來和統一度量衡與統一車軌的工作相提並論，才更加顯出統一文字的重要性來。而《說文·序》說“言語異聲”，當時有無現代訂定國語的企圖，不得而知，然而總要有一個標準。據段注，小篆三千三百字，可能是當時較常用的字，那麼當時統一字體，還具有我第二項所說選擇常用字的功效呢！後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雖然具有整理當時篆書、闡明字源的功效，可是當時流行的是隸書。以後將經書刻石，就同時具有統一字體的功效。《後漢書·蔡邕傳》：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

六朝是文字最混亂的時期，也是俗文字非常流行的時期。《通俗文》是最早的一部搜集俗文字的書。後來有王羲之《小學篇》，葛洪《要用字苑》，何天承《纂文》，阮孝緒《文字集略》等。

到了唐代，有所謂字樣之學，唐太宗貞觀七年（623）頒布顏師古《五經定本》於天下。顏師古又著有《字樣》一書。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序》說：

“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警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

《干祿字書》把通行的楷書分為俗通正三類，他說：

“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

舉例如下：

“聰聰聰<sup>上中通，下正，諸從
悉者並同，他皆放此</sup> 功功<sup>上俗
下正</sup>…… 衷衷、馮馮、
右雄雄、虫蟲<sup>並上俗
下正</sup>…… 彤彤<sup>上赤色，徒冬反；
下祭名，音融。</sup>”

這書在唐代宗大曆九年（774）顏元孫的姪子顏真卿做湖州太守時，書寫刻石。國子司業張參在大曆中作《五經文字》，唐玄度在唐文宗大和七年（853）覆定石經字體，在大和年間寫成《九經字樣》，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的石經，成為正楷的標準。

⑦清代康熙五十五年（1716）序刊的《康熙字典》，根據明代梅膺祚的《字彙》、張自烈的《正字通》等書為底本，而加以擴充，其分部和楷法奠定了三百年來的漢字標準。

民國十一年（1922）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錢玄同氏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認為應當將簡體字竭力推行，正式應用於教育上、文藝上，以及一切學術上、政治上。不認它是現行漢字的破體字，而認它是現行漢字的改良之體。當時議決通過，即組織漢字省體委員會。民國二十一年（1932）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把習用的簡體字大都收入了。錢玄同氏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又提出了一個搜探固有而較實

用的簡體字案，才議決動手編《簡體字譜》。民國二十四年（1935）八月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計三百二十四字，未幾，由國民政府明令取消。

民國三十八年（1949）後，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曾一再建議简化文字以便利人民。教育部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六月聘請專家十五人，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四十三年（1954）二月立法委員廖維藩等一〇六人向立法院提出文字制定程序法案，主張規定我國新製文字及編訂之字書韻書應由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咨請總統公布施行；並指摘羅家倫氏的简化文字主張。羅氏於三月十七日發表《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一文，加以答辯，因此引起一場大辯論，本人在民國四十四年（1955）也曾發表《論簡體字》和《續論簡體字》二文（見《中國語文論叢》）。

民國五十八年（1969）四月十日，何應欽在中國國民黨十全大會提出建議由教育部會同中央研究院，切實研究整理簡筆字，以適應當前之教學實用一案，並編有《簡筆字彙輯》（油印本），收入簡字 747 個，後來也因為遭遇到反對而未能實現，不了了之。

歷來整理文字的工作，大都在天下統一的時候，目前還有許多其他的緊急工作要做，能夠維持現狀，遵守三百年來《康熙字典》留下的傳統，也並無不可，不過因為時間的改變，也發生了不少的變化，似乎也有稍加整理的必要。例如“者”字較通行的寫法多一點，“黃”字較通行的寫法多一小橫，檢查筆劃也有多少的區別了。還有一字異體的是否需要劃一，也是值得考慮的，例如“臺”和“台”，本人對此不願多加討論。

關於整理漢字，漢字的讀音問題當然也在考慮之列。例如“和”在“我和你”中作聯詞用時，國語推行委員會根據道地的北平人齊鐵恨先生的讀音讀作ㄏㄢˋ(hàn)，但是一般人受書面讀音的影響讀作ㄏㄜˊ(hé)，董同龢《國語與北平話》（《大陸雜誌》一卷十期，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1950）指出國語不應把“和”讀為ㄏㄢˋ，國語並不等於北平話。國語是以前北平的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甚至於要顧慮到全國各地大多數人的方便，並不是完全以道地北平人口中的話為根據的。現在在電視中，時常可以聽到“我和你”的“和”讀ㄏㄜˊ，以後是否能戰勝前

⑦ 潘重規《中國文字學》第一章第四節《中國文字學的簡史》。唐蘭《中國文字學》P. 18、19 說“唐人因六朝文字混亂，又有一種整齊劃一的運動，這是字樣之學。顏師古作《字樣》，杜延業作《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作《干祿字書》，歐陽融作《經典分毫正字》，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西元七三五）作《開元文字音義》，自序說：“古文字唯《說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備所遺缺，首定隸書，次存篆字，凡三百二十部，合為三十卷。”林罕說：“隸體自此始定。”中國文字學史上第一次同文字是秦時的小篆，結果失敗了。這第二次定隸書（即現在所謂楷書），卻成功了。楷書體到現在還行用，已經經過一千二百年了。後來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宋張有作《復古篇》，一直到近世的《字學舉隅》，都屬於這個系統。”《干祿字書》分平上去入四部分，共有 804 組，每組二字或三字。絕大多數是分別一字異體的，一小部分是分別近似的兩個字的，如“彤”和“彤”。《五經文字》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黃得時著《歷代字書與常用字彙》（《圖書館學報》，第七期，民國五十四年）指出：黃覺民氏曾報導我國十三經全部所用單字為 6,544 個，五經中則只有 4,754 個不同的單字。

一讀法，首先要從小學課本來規定。這個問題牽涉到近幾十年我們對於國語的看法和語言學的趨勢。在民國初年第一次訂定國音字母時，注意規範化，有入聲，兼顧南方的讀音；後來覺得有點非驢非馬，就完全根據北平的語音。當時主張以受過中上教育的道地北平人口中的話為根據，而不大注重全國的規範化。就連趙元任先生的國語著作，有一個書評批評他用的兒化字太多，例如“今天”“明天”，北平人說成“今儿”“明儿”，可是全國大多數的人只聽得懂前者，而不懂得後者，就以採用前者為宜。北平話中有一字兩讀而與語義無關的，如“波”讀ㄅㄛ (bo)和ㄅㄛ (po)，但前者全國各地大都通用，而後者為例外，就以採用前者為宜。又如北平話的“腦袋瓜子”、“bel棒”(特別好)，除非使用在小說、戲劇的對話中以增加北平的地方色彩而外，在平常的語言中不宜提倡。又如北平話的“他們沒來呢還”也以說成“他們還沒來呢”為宜。這都是國語和北平話的區別，似乎國語在語音、語彙、語法諸方面，都應該加以規範化，不能完全把道地北平人口中的話作為金科玉律看待。